



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文艺系列》之二

# 加冷营



侯亨能博士

朝花企业出版



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文艺系列》之二

# 加冷营

侯亨能博士

朝花企业出版

《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文艺系列》之二

- 书 名 : 《扣留营诗抄》  
作 者 : 侯亨能  
书 法 : 侯亨能  
出 版 : 朝花企业  
Wasasa Enterprise (001135490-D)  
1068-1, Jalan Sentul,  
51000 Kuala Lumpur  
承 印 : Polar Vista Sdn Bhd (318716-P)  
出版日期 : 2006年12月  
ISBN : 983-99456-8-8  
定 价 : RM20.00 (西马)  
RM22.00 (东马)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辑委员会

**执行编委：**（接姓氏笔划为序）

万家安、古文煌、伍 安、李 尚、李立安  
祝俊雄、张永新、张发起（已故）、洪旭涯  
汤 毅、谢爱萍博士、辜瑞荣、蔡添强。

**编委：**

王开焕、邓玉兰、邓耀增、刘东明、刘子龙  
许全钦、许金龙、许博义、吴维湘、麦 翔  
李群熙、李海洲、李秀华、李儒森、陈炳新  
陈进丰、陈群民、陈世民、张北生、张文健  
高叔平、莫桂梅、黄展南、黄应清、黄海秋  
程国强、傅进德、谢仗先、杨潘照、杨坤木  
杨静来、彭佛生、蔡检年、锺日清、廖森辉  
戴经达。

**法律顾问：**

谢春荣、陈泽玉、杨培根。

# 总序

我们曾经走在崎岖黑暗的路上，大家怀着同样一个希望，朝着有曙光的方向不停地前进。

我们曾经留下许多痕迹，那是由理想、热诚、欢腾以及愤慨、挫折、血与泪编织而成却无法抹去的历史片段。

我们决定把我们走过的路，留下的痕迹展现出来，不再被刻意隐瞒和遗忘：让它对那段由于拥有权势而任意裁剪制造出来的“独立建国史”，作出应有的纠正和补充。

这就是《历史的另一面》。

当年，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曾来自四面八方，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掀起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各个领域，如学运、工运、农运、文教及其他各行各业，通过各种斗争进行反殖、反帝，宣扬社会主义运动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争取独立和建国，更重要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多元化社会。

殖民主义者的本质，贪婪和残暴，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压迫和奴役，搜刮天然资源和榨取廉价劳工，如遇到不合作或反抗，就进行镇压，甚至屠杀。当年，老奸巨猾的英殖民统治者更是魔高



一文，把欺骗、离间、分化、收买、渗透和颠覆作为统治的另一手段。于是，我国人民面对不断的逮捕、监禁、驱逐出境，将乡村无辜人民杀害却嫁祸别人，几十万人民百姓被驱离家园而赶入大型集中营——新村里，许多团体被查封，新闻被封锁，群众议论被压制，限制民族语文教育发展，而强制推行宗主国的奴化教育。另一方面，豢养叛徒走狗渗透社团和学府，专搞破坏和颠覆活动。

英殖民统治者曾得意地夸耀，当年他们在马来亚最成功的功绩，就是建立了新村（把人民百姓集中起来，用铁丝网围着，一入夜即戒严，进出口处只有一个，容易监视每个人的行动），和分化民族间的团结关系及破坏反抗组织。

但是，尽管英殖民统治者采取任何手段进行镇压，仍是无法阻止人民持续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斗争。

英殖民统治者一方面要应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也穷于应付人民群众的不断反抗，在经济利益方面也遭受重大损失。再加上二战后的国际形势，所有殖民地人民都掀起了一片独立解放斗争的浪潮。殖民主义者眼看大势已去，再也无法压制人民的斗争和要求，独立是迟早的事。在面对种种困扰下，不得不改变和放弃对马来亚的直接统治。英殖民统治者事先作了安排，培养一批封建贵族、官僚买办阶级、亲英殖民主义份子，准备把政权交给他们。因此，马来亚的独立，不管通过什么



方式得来，促成独立的背景和因素却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本国的封建贵族和官僚买办攫取了广大人民的斗争成果，夸夸其谈，说什么：“独立是谈判得来的，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刻意编造的谎言！

独立后，国家的社会面貌并没有任何改变，百分之百靠拢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内继续使用《紧急法令》及后来的《内安法令》，不断进行逮捕、监禁，禁止罢工、结社、言论自由；压制民族文化、出版事业（禁歌、禁书、禁舞等不胜枚举），摧残民族语文教育，刁难公民权申请等等；在经济方面，完全继承殖民地时期的衣钵，丝毫没有发展民族经济的迹象；对在独立斗争时期的牺牲品之一的“新村”，不屑一顾，任其自生自灭；对因参加抗英活动而被英殖民统治者扣留监禁人士，继续作无限期监禁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在说明了，独立后接掌政权的联盟政府只是取代英国，采取同样手法统治马来亚罢了。因此，人民普遍不满，认为要建立一个完整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就必须继续斗争，直到取代联盟政府为止。

联盟政府时期的在野党有：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国民党、回教党、马来亚人民进步党、马来亚党等。

社阵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日），由劳工党、人民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于1958年



被联盟政府封禁）组成。后又得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党加入。当时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种族主义，照顾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政治经济上，标明要摆脱殖民地阴影，维护民主、人权，发展民族经济；在国际上采取中立立场，特别是在亚洲地域，主张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列五一劳动节为公共假期等。

然而，这些主张却被联盟政府视为“亲共”。是配合马来亚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因而，社阵遭受联盟政府的不断镇压，除了大量各级干部被逮捕和长期监禁外，还进一步封禁各地支部。

社阵的组织在当时高压政策之下而消失，然而，社阵在当时所提出的一部分主张，却受到国阵政府默默认同，并且付诸实施。如承认五一劳动节，并列为公共假期，提高工人福利，提升教育水平，反对依赖西方列强，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等等。

当然，社阵还有大部分主张：如切实的民主、维护人权、公平对待各族人民、公平分配经济成果，公共企业国有化等政策尚未落实和实现，有待我国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进一步去探讨和争取。

《历史的另一面》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尽量做到使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和完整。历史的任务，承前启后，因此，她也是一面未走完的历史标志。





《历史的另一面》的筹备工作，从1996年10月开始，于1997年6月7日组成编辑委员会，委员来自半岛各地，大多数是曾经经历过独立建国斗争的参与者，也有《紧急法令》和《内安法令》下的受害者，此外，也有多位是年轻社会工作者。

《历史的另一面》的编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特别是在某种环境底下，史料的储存和来源都有一定的局限，更增加了工作的困难。尽管这样，我们恳切希望集腋成裘，希望更多的人或积极参与编委工作或提供作品，或提供所收集储存的资料：如文件、图片、相片等（由于1963年后马来西亚的成立，我们须要收集的资料包括东马的砂劳越和沙巴）。

万事起头难，再难也要克服，这是我们的传统。既已起步，就得走下去，直至《历史的另一面》完整地公诸于世。愿以此与大家共勉之。

《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

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 侯亨能博士

## 学历：

- 1974 马来亚大学电气工程学士  
1985 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企管硕士  
1992 英国国际管理中心企管博士

## 职业经验：

- 1974-1980 马来西亚电讯部工程师  
1980-1994 芙蓉摩多罗拉有限公司  
工程师  
生产经理  
技术经理  
高级经理  
1994-1996 奥维尔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1996-1998 南洋商报  
总经理  
1998-2000 希特工程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2000-2003 英迪学院  
品质管理高级主任



# 社会经验：

- 1992 - 2002 马来西亚芙蓉中华中学董事会  
计划与发展组主任
- 1993 MOTOROLA亚洲环保理事会  
主席
- 1994 - 1996 马来西亚董教总  
委员
- 1996 马来西亚芙蓉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委员
- 1997 马来西亚爱国行动委员会  
副主席

侯博士于1949年出生在吉隆坡的甲洞埠。甲洞埠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中是个有名的地方。侯博士从小耳濡目染当地气氛，致使他成为一名关心国家政治发展的活跃份子。

在马大求学时，他非常活跃于华文学会，擅长于诗歌朗诵，曾经写过几部舞台演出剧本。由于在华文学会的献心献力，他早已被政治部点中，等待时机加以对付。1974年，华玲发生农民因饥饿吃山薯而中毒身死的事件，马大学生，尤其马来学生，群起示威抗议。当局乘机大事逮捕学生，并嫁祸于马大华文学会。当时侯博士已经毕业，但是当局仍然将他逮捕，并扣留在甘文丁政扣营长达5年。在扣



留期间，侯博士被推选为扣留者代表，与营方谈判福利问题。扣留期间是侯博士一个重要的人生培训时期。他有很多感触，很多思索，很多提升。诗集所写的只是他生活的一部份。

释放之后，他在芙蓉的摩托罗拉电子公司服务了十四年，业余攻读企管硕士和企管博士学位。十四年之后，他离开摩多罗拉，加入丰隆集团的奥维尔公司，充当其总经理。1996年，被丰隆转移至南洋商报，充当其总经理。1997年发生“亚洲经济风暴”，他发动组织全马爱国运动，到处演讲，一时风云激荡。1998年，他离开南洋商报，成为希特工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99年3月12日，他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一场严重的车祸，丧失意识数月，生命危在旦夕。事发之后，他的人生观起了一些变化。他加入英迪学院成为其品管高级主任。2003年，他决定全面退出职场，成为一个自由人，专心进行文艺创作与管理培训。

电邮地址 : lawhn@yahoo.com  
手提电话 : +6 012 2117866  
传真 : +6 06 7614760  
地址 : 520 Taman Bkt Chedang  
703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侯亨能伫立在甘文丁扣留营七区起初，营方还允许在扣留营里自己拍照，以后就下令阻止了。这是我进营不久之后拍的。



侯亨能与爱人郭洙婷在扣留营



当前的侯亨能博士



# 自序

光阴似箭，一转眼，那火红的年代，那激越的心扉，都已消逝无迹。如今，头上白发已萌长，额上鬓角已衰萎，从职场完全撤退，即脱离功名利禄的追求，摒弃庸庸碌碌的生涯，成个自由人，自己的命运，自己来掌握。翻开旧箱篋，一无所有，唯有这两间的诗吟。

xiii

我的进入扣留营，完全是当局的算计。当时我已经毕业，但是全马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马来学生示威，它们为了找借口，为了嫁妆，便把积极的华文学会份子一并逮捕，于是我进了扣留营。

扣留营的目的是抹杀被扣者的斗志，写诗，是不受鼓励的。我都是暗自抒发自己的感情，偷偷在写，有时把写好的诗寄出去给爱人，也被打回。

营方有时会进营来大事搜查我们的东西，发现不喜欢的就没收。所以，我把这些诗都写成很小的字体，收藏在各处。



在释放时，我也把这些写成小字体的诗，卷入保济丸的药包里，而得以逃过被没收的命运。

我的这些诗抄，完全秘密收藏，连和我同住的兴祥与文波都不知道我曾经写诗。这是首次出版面市。

出版这本诗集，除了是一种纪念，也是对自己的激励，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再做出一些贡献，一如我在释放时说的：

我能带回些什么呢？  
除了这颗依然腾耀的心  
准备再看一世纪的人情



## PREFACE FOR HOU HENG NENG'S COLLECTION OF POE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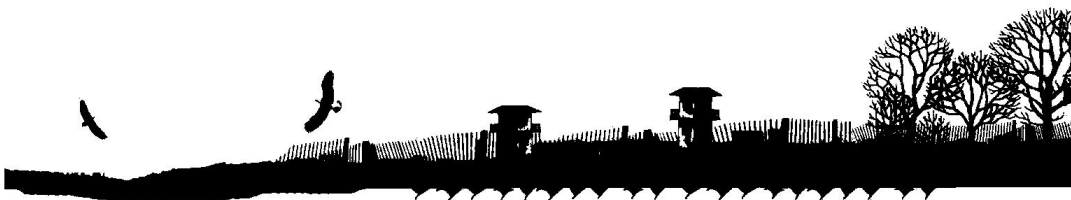
*Dr Syed Husin Ali*

Hou Heng Neng (I normally call him “Law”) was detained together with me and nine others (including Anwar Ibrahim) under the ISA, at Kamunting Detention Camp, from the end of 1974. We were incarcerated following demonstrations by student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o support the hunger marches by thousands of peasants in Baling, Kedah.

xv

At the beginning, over a thousand students and lecturers were arrested; most of them released after a couple of days. Out of these, forty were held up to two months, for interrogations and also as punishment. Eleven of us were finally served the order of detention. Our period of incarceration varied from nine months to nearly six years. Law was detained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Belonging to the “Baling group”, we were initially put together in the same dormitory in “Kawasan 7”. For many months we ate, slept, studied, played and worked together. Every morning we mutually taught each other the Chinese and Malay language. Almost every night, we sat around the table chatting, cracking jokes, sharing experiences, and also discussing some serious issues. Perhaps the camp authorities (especially the SB operatives) did not like the solidarity and comradeship that was evolving amongst us.





One day, without explanation, Law and his friends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CLS) were moved out to “Kawasan 5”, which was known to be for so-called “hard core”. Later, after repeated inquiries and protests, we were told by the Camp Superintendent that this was a form of punishment because they climbed the zinc partition separating our areas, to talk to some inmates of the neighbouring “kawasan”.

Law and his friends could hardly be considered as “hard core”, but of course the CLS was alleged in a government White Paper, published after the mass arrests, as carrying out pro-communist activities. It was the fashion then for the government to throw groundless allegations, by implicating the communists, to justify their use of the ISA on anyone or any group. They could easily do this since the ISA does not allow for open trial in the court of law.

Those of us remaining in “Kawasan 7” were all Malays, who were leaders of various youth or student organisations. I was the only lecturer among them, and at that time secret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cademic Staff Association. We continued with the normal activities.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that we now had no Mandarin teacher or Qigong instructor.

One day I was taken to Penang for SB interrogations. When I returned to the “kawasan”, I saw only Kamarazzaman there. He informed me that Anwar and the others were shifted to a new “kawasan”. I persisted to find out why we were separated. Finally, I was reluctantly informed by a Deputy Superintendent that this was following an order from “the top”, because we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different orientations – whatever that could have meant.

